

The title is preceded by seven thick, horizontal yellow bars of varying lengths, stacked vertically.

二十年代 中国各流派 诗人论

陆耀东 著

A vertical decorative elemen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featuring a red background with a gold-colored border and a central gold-colored rectangular are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

陆耀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北京



21046653

1046653

责任编辑 张晓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李 木

版式设计 李玲玲

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

Ershiniandai Zhongguo Geliupai Shiren lun

陆耀东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统一书号: 10190·200 定价: 1.9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收作者诗人论十篇，从流派角度论及二十年代活跃在我国新诗坛上的十四位诗人，他们是郭沫若、蒋光慈、朱自清、冰心、“湖畔”四诗人、刘半农、刘大白、冯至、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作者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诗人及其诗作进行全面考察、分析，以比较广泛的文学知识和细腻的艺术感受能力驱遣丰富的材料，为读者勾勒了当时新诗创作的面貌，并探讨了有关理论问题。



DC79/20

目

录

论郭沫若的诗.....	(1)
论蒋光慈的诗.....	(48)
论朱自清的诗.....	(68)
论冰心的诗.....	(87)
论“湖畔”派的诗.....	(107)
论刘半农、刘大白的诗.....	(142)
论冯至的诗.....	(169)
论闻一多的诗.....	(201)
论徐志摩的诗.....	(230)
论李金发的诗.....	(270)
附：新诗第一个十年鸟瞰.....	(311)
后记.....	(339)

论郭沫若的诗

在中国新诗天际的灿烂群星中，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是最明亮的一颗。“五四”时代，他真是一代天骄，诗坛泰斗；“五四”后，他虽然象曾攀登过珠穆朗玛峰顶的登山英雄，力渐不逮当年，然雄心不已。创作热情历久不衰，诗神在他心中，几乎和他的生命一样长寿。这里，我想着重探讨郭沫若成为诗界巨人的原因；郭诗（主要是《女神》）在思想和艺术的整体上，提供了哪些为前人和同时代人所不曾提供过的最可宝贵的东西；郭诗对新诗的巨大影响和郭诗给我们的启示。

要是只能表达自己那一点点主观感情，他是不配称为诗人的；只有当他能够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时候，他才是个诗人。

——歌德

俄国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师别林斯基说：“诗人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他的祖国的公民，他的时代的子孙，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影响，不能比别人影响少些。”^① 这里，概括出诗作者能成为伟大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诗人自然是有自己个性的人，同时，又应和祖国、时代、民族、人民共着生命和脉搏，至少是在思想上相通。古今中外的伟大诗人，都是如此。我国“五四”以来的优秀诗人，也概莫能外。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诗坛巨匠，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时代；他的家庭条件和个人的生活道路；个性（包括天资或者说天才、艺术审美情趣）等。把问题简单化或神秘化，都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导致正确的结论。这三个方面，时代是最重要的，但后面两个方面也不可忽视。

郭沫若在本世纪初叶就开始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一九一四年赴日本留学。五四运动前后，他仍在东瀛。而当时的日本，正如郭沫若所说：“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国的劳工运动上和文化运动上有一个划时期的促进。日本思想界之一再显著地呈出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候起头。”^② 郭氏在日本，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想的熏陶，受到了斯宾诺莎、尼采、泰戈尔、达尔文、克罗齐、歌德、惠特曼、列宁等人著作的影响，形成了以泛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的泛神论思想，就象是火药，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象是点燃他诗创作灵感爆发的烈火。据诗人自己说：

①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沫若文集（七）·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在民八、民九之交的《学灯》栏，差不多天天都有我的诗。……

《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手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

在民八、九之交，那种发作时时来袭击我。一来袭击，我便和扶乩笔的人一样，写起诗来。有时连写也写不赢。但这种发作期不久就消失了。①

之所以出现这种创作灵感的爆发期，原因并不单一。其中时代的原因是决定性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可以说，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没有日本思想界的左倾，没有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就不会有《女神》。正因为时代为郭沫若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才使他具有“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能力。

如所周知，五四运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前的任何一次革命运动之处，是它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在“五四”时期，封建复古主义者不可能正确“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反帝反封建不彻底的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只有共产主义者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才能正确地充分地“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是拥护十月革命的彻底反帝反封建

① 《沫若文集（十一）·我的作诗的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具有“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能力。

许多事实说明，时代精神以巨大的力量冲击着诗人心灵上涡轮发电机的叶片，从而产生了异常惊人的热能，爆发出无穷的艺术创造力。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考察到时代原因就止步，那就可以说，还只是走了一半路程，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五四”时有不少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的诗人，为什么其他诗人的作品，不及《女神》的时代精神那么充分，那样汹涌澎湃？因此，我们还必须从郭沫若个人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方面进行探求。

郭沫若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嘉定沙湾的一个颇富的家庭，长兄郭橙坞是民主革命派，辛亥革命后，曾任川边驻京代表，对郭沫若出川和去日本留学，起了决定作用。郭沫若说：“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①他的故乡，是具有反抗精神和义气的“土匪”的聚居地。有一两个“土匪”给少年郭沫若留下深刻的印象，小时候郭在家塾里受过残酷的封建“教刑”，这对他的叛逆性格的萌芽、成长起了催化的作用。稍后在小学，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本是第一，但却被无端扣分，压到第三名。郭沫若说：“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②在小学和中学，他又多次被卷入学潮，几次被学校“斥退”，特别是青年时代，那使他极为反感并造成他莫大痛苦的封建婚姻，更激发了他对于旧礼教的痛恨。出国前，从耳闻目睹中，他早已感觉到帝国主义的魔影的威压；到日本后，他作为弱国

①② 〈沫若文集（七）·我的学生时代〉。

的臣民在那儿经常受到歧视、屈辱和迫害，反帝爱国激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切，不仅促进了他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也成了他的诗创作灵感冲动的热能，为他感情的火山爆发作了积蓄。

郭沫若能写出《女神》这样杰出的诗，和他的独特的个性，也不无关系。自然，一个人身上的共性和个性，是难以机械地分割的，上面我们谈到的，实际上其中就有他的个性在。这里，为了进一步说明往往为我们所不注意的诗人个性在创作中的作用问题，不得不再强调一下。郭沫若天资聪慧，感觉敏锐，长于想象，感情异常丰富而极易激动，富浪漫情调，性格外向，赤子之心往往直露。他自己也说过：“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支芦笛。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Impulsivist，……我回顾我所走过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一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①这是郭沫若个性上的一些特点，也是他《女神》抒情主人公的特色之一。

我们如果将郭沫若与鲁迅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也许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个性的不同，天资的特长，对创作有着明显的作用。鲁迅长于观察，长于理论分析，生活态度严峻而感情深沉，他在小说、杂文和理论建树方面，远远超过郭

^① 《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光华书局1928年1月版，下同。

沫若，他的新诗不能说没有特点，但不是大家之作。郭沫若的小说成就不大，而新诗创作却远非鲁迅所能及。其中原因之一，就与郭沫若具有更多的诗人气质有关。

这里必须说明，天资、气质等等，正如郭沫若在“五四”时所说：“天才是人，绝不是人以外的甚么怪物。他与凡人的区别只有数量的相差，而没有品质的悬异。……天才所得于自然的是‘天赋独厚’，然而自然对天才的恩惠也只有这么一点。”^①就诗创作而言，天才和气质，有时起着相当的作用。

对于诗人来说，我们还不可忽视他在艺术方面为“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而做的准备。郭沫若入蒙馆前，母亲就教他诵诗。四岁半入蒙馆，读唐诗、《千家诗》、《诗经》。在高小时代，读到《西厢》、《花月痕》等。在中学时代，读林译小说和梁启超的文章和《庄子》等。屈原、王维、李白等人的诗，深受郭沫若喜爱。到日本留学后，学会了日语、英语、德语，从外国文学中吸取了营养。他后来说：

自己在国内所涉猎的，主要的就是文学。到了日本虽然把文学抛弃了，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②

应该指出，中外诗人中，屈原、王维、李白、泰戈尔、歌

① 《文艺论集·天才与教育》。

② 《沫若文集（七）·我的学生时代》。

德、惠特曼的作品，对《女神》的创作，助益尤大。

为郭沫若艺术地“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提供了条件的，是他在外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女神》的成功，与这有密切关系。郭沫若当时的文艺思想，包含着下列几点：

（一）轻反映，重创造。他说：“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作自然的老子！”^①又说：“我对于艺术的见解，终觉不当是反射的Reflective，应当是创造的Creative。”^②这样，他在诗中就不拘泥于现实的照相式的反映，能放笔挥洒。

（二）着意于表现理想和反抗的精神。他说：“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我们受现实的苦痛太深巨了。现实的一切我们不惟不能全盘肯定，我们要准依我们最高的理想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③他认为：“文学是反抗精神底象征，是生命穷促时叫出来的一种革命”^④；“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⑤这与他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泛神论、尼采的反偶像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等观点相结合，就成了《凤凰涅槃》、《天狗》、《匪徒颂》这些作品的精神上和艺术上的母亲。

（三）主张抒写自我，自然流露。他并不是反对写社会，而是认为“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

① 《文艺论集·自然与艺术》。

② 《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③ 《文艺论集·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

④⑤ 《文艺论集·〈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

闷来，不必定要精赤裸裸地描写社会的文字，然后才能算是满纸的血泪。”^①又说：“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②又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③；“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④他甚至极而言之说：“文艺的创作比如在作梦。梦时的境地是忘却肉体，离去物界的唯心的活动。创作家要有极丰富的生活，并且要能办到忘我忘物的境地时，才能做得好梦来。”^⑤这些观点，对于浪漫主义抒情诗来说，是合适的。而对于在“五四”时能收时代风云于胸中的郭沫若来说，尤其合适。如所周知，“五四”时期，郭沫若的热爱祖国、热爱劳动者的感情，为自由、人道、正义而战的叫喊，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反对一切对于个性的束缚，要求爱情自由的呼声，狂放不羁的性格，都与那时的时代精神合拍。因而，他的“抒写自我”的主张，恰好便于充分表现时代精神，便于表现他的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便于充分表现抒情诗主人公的个性。表现时代精神与表现自我，在当时的诗人郭沫若身上，是二而一的东西，是没有矛盾的。

应该说，《女神》是主客观诸种因素的结晶。在诸多因素中，有的占的比重大些，有的占的比重小些。但缺少任何一

① 《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②③④ 郭沫若、宗白华、田寿昌：《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版。

⑤ 《文艺论集·批评与梦》。

个因素，或者说，任何一个因素在性质上或份量上有所变异的话，那么，《女神》就是另一番模样。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否认创作冲动，创作灵感的存在和作用。《女神》中的一些最优秀的诗章，诗人几乎在激动得发狂的情况下创作的。我们如果只是一般地从生活、思想感情、艺术技巧来观察，就难以回答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这种现象：他在“五四”后，思想向前发展了，生活阅历更丰富了，艺术修养更高了，并且经历了“五卅”大革命这样激动人心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为什么写不出《女神》似的象大海的波涛一样有气势的杰作？可见，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在起作用，在触引灵感的爆发。例如郭沫若同志说，他的创作冲动的冷却和消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学灯》的编辑宗白华到德国留学，继任者每每给郭以不公正的待遇，“有一次他把我的诗附在另一位诗人的诗后发表了，但那位诗人的诗却是我在《学灯》上发表过的《呜咽》一诗的抄袭，仅仅改头换面地更换了一些字句。这件微细的事不知怎的就象当头淋了我一盆冷水。我以后便再没有为《学灯》写诗，更把那和狂涛暴涨一样的写诗欲望冷下去了。”^①一方面，他的创作热必然会冷下去，因为“五四”的热浪也渐渐冷却了，也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长久地保持着创作冲动，因此，他即使不遇到这样的偶然事件，也会因别的事而冷却下去；另一方面，又有偶然性。

当我们这样简略地从各方面考察了郭沫若诗创作的准备条件后，就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写出《女神》，决非偶然，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因为他在“五四”前夕，就从各方面

^① 《沫若文集（十一）·我的作诗的经过》。

具备了用诗的形式“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能力。

——
——
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
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

——艾略特

郭沫若什么时候开始写新诗，已有一些同志作了考证，然而尚待进一步研究。诗人自己在一九三二年和以前的所有文章中，都说“最早的诗，大概是一九一八年初夏作的”。从一九三六年写的《我的作诗经过》一文始，说一九一六年开始写新诗。从现有旁证材料看，一九一六年下半年开始写新诗，是最早的极限。郭氏最早发表新诗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这时，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陈独秀、鲁迅、俞平伯、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都已发表过诗作了。但是，郭沫若“异军独起”，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新诗作者。

郭沫若的《女神》，其中最优秀的诗篇，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时代的肖子。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诗史中，只有少数诗作能与之相比拟。郭沫若收时代风云于胸中，孕育为诗的精髓，发而为诗，遂成惊天动地之作。

时代精神在理论家的笔下，也许可以用几句话概括。而在文艺作品中，则表现得极其丰富多彩。《女神》尤其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鲁迅的作品外，恐怕再没比郭沫若的《女神》更能充分表现时代精神了。

大家知道，被帝国主义欺凌近八十年的中国人民的心中，

早已象堆满了干柴，五四运动点燃了一把火，于是反帝爱国烈火腾空而起，烧红了中国的天际。郭沫若虽然身居东瀛，但心在祖国。他曾和友人组织“夏社”，进行爱国宣传。更因祖国这一空前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激发了一次诗创作的高潮。

二十年代的新诗作者，绝大多数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最优秀的爱国诗，当推郭沫若和闻一多。郭沫若的《炉中煤》，无论就诗情诗意诗趣，内在律或外在律，确是一代绝唱。诗共四节，每节五行，各行字数不一，但都在七至十一字之间。韵脚则基本上采隔行押韵的形式。诗人将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寄寓炉中煤向年青女郎抒发爱情的形式写出。诗的首尾两节略有变化，但基本上是采用首尾相应，反复吟咏的章法。第二、三节叙述煤自身的历史，原是栋梁之才，被埋地下，经久成了黑炭。巧妙地点出：正是“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这般模样！

诗的意境完整，优美。对祖国的思念，就象是对自己心上年青女郎的思念一样，其中蕴含着深沉热烈的诗情。诗仅在副标题上写着“眷恋祖国的情绪”，诗中则字字写炉中煤，不板滞，不牵强，有内蕴而不晦涩，明朗却不浅露。

郭沫若的爱国诗，抒发的多是白热化的感情，但感情表

达方式，并不单调。如果说《炉中煤》是以浓情柔情出之，那么，在《棠棣之花》中，则是以慷慨激昂、英勇献身的悲壮方式表现，聂婪为弟弟唱的送别歌，豪情压倒生死离别的悲伤：

去罢！二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二弟呀，去罢！

《胜利的死》是为爱尔兰独立军领袖马克司威尼牺牲而作。称颂这位爱国者的死，是“悲壮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胜利的死哟！”这些诗，对于进行反帝斗争的勇士，是巨大的鼓舞！

《女神》中的爱国主义，既是屈原以降的爱国主义传统的继续和发扬，又具有时代的特色新的内容。在这个诗集里，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同对反动势力的恨结合在一起；同期望旧中国的灭亡、希望祖国的新生结合在一起；同反抗精神、革命精神、创造精神结合在一起。最后这一点，也是它区别于闻一多《死水》的爱国主义之处。如果说，《女神》是一匹彩锦，那么爱国主义是它的经线，反抗精神、革命精神、创造精神则是它的纬线。

《女神之再生》是根据中国古代神话写成的诗剧。它以宏伟的结构、深刻的寓意、象征的手法，精采地、充分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时代的需要。共工、颛顼之战，暗寓当时的军阀混战。